



乡村记忆

矿上重名趣事

乡场上的露天电影

魏吉林

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,娱乐生活十分匮乏。最让全村老少翘首以盼,堪比过节的盛事,便是县里的流动电影放映队到村里来放电影。

电影放映队人手不多,往往只有两三人。进村后,统一安顿在大队干部家中,食宿都由村里安排。放映队大多下午抵达,然后在广场上埋杆子、拉银幕,村里的孩子们见了都愿意帮忙。要是能被放映员指派干点辅助的活,孩子心里准美得不行,仿佛捞到了天大的幸运。放映员在院子里倒片子,摇动倒片机,“呜呜”的转轴声在小院里回荡。外来的拷贝大多片尾在前,必须仔细倒回片头,夜里才能正常放映。孩子们总爱围在放映员身旁,目不转睛盯着转轮上闪闪发亮的胶片,满心好奇:这样一条又窄又长的胶片,怎么就能投射出活灵活现的人物,传出阵阵欢声笑语。长辈们则在一旁反复叮嘱,千万不能伸手触碰,生怕弄坏这份来之不易的珍贵拷贝。

放映场地固定在村中央供销社前的小广场。天色尚未完全暗下,心急的孩子便坐不住了,匆匆扒上几口晚饭,撂下碗筷,搬起小板凳一路飞奔,抢占广场正中靠前的好位置。

夜色一点点落下来,供销社前的小广场渐渐涌满了人。暮色里,板凳碰撞的咣当声、吵吵嚷嚷的人声,搅成一团。后到的乡亲侧着身子使劲往里面钻,不时传来被踩脚的惊呼,间或夹杂几句拌嘴。整片场地喧嚣沸腾,直到放映机“嗡”的一声响起,嘈杂声才缓缓退去。实在来得晚或者是不愿意和年轻人挤的老人,就在银幕的背面坐下看。一次我中途去撒尿,走到银幕背面,看到很多老年人都仰着脸看得津津有味,我往银幕上一看,人像都是左右颠倒的,影像也模糊不清。

广场上人挤人,密不透风,进出都十分困难。电影放映时,有的孩子想要撒尿,大人们总会嘱咐孩子尽量忍耐,等换片亮灯再出去。正片放映的时候,四下黑漆漆的,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碍事,跑出去之后,很难找回原先的位置。放映当中不能大声喊叫找人,不然会打扰旁人看电影。中途换片亮灯的几分钟,是大家默认的放松时间,电影停了,大家都松口气,说话、吆喝都无妨。孩子出去要是找不到家人,只管大声喊爹娘,大人也能应声招呼。看电影时,有的孩子实在憋不住,便蹲在原地解决。就这样,即便脚下的地面带着潮气,弥漫着淡淡的尿臊味,周围人依旧看得投入。常年流转各村的拷贝胶片,

被无数次播放、倒卷、拉扯,齿孔磨损严重,断片更是家常便饭。放映中途胶片突然扯断,银幕瞬间漆黑一片,全场便响起一阵细碎的叹息。夜里观影人多、时间紧张,放映员只能就地取材,用白色医用胶布临时粘接,尽快恢复放映。

胶布只是应急补救,并不牢靠。等到第二天赶赴下一个村子,放映员再仔细检修,找出所有胶布接头,剪去胶片破损的边角,对齐画格与声带,用专业接片器加压粘合,细细修复。

放映队的行程,由县电影公司提前数月排定,环环相扣,每个村子一年只能轮上一次放映,且仅仅停留一日。天气好便当夜放映,倘若遇上坏天气没能如期播放,也不会延期补映,第二天必须奔赴下一个村庄。

乡村看电影,全看老天脸色。有时放映中途飘起绵绵小雨,电影也不会中途停映。乡亲们舍不得这场难得的光影盛宴,放映员也尽量坚持把片子放完。有人撑起大伞,小心翼翼护住放映设备,不让雨水侵蚀机器;台下观众也不愿散去,有的人脱下上衣顶在头顶,有的人任凭细雨打湿头发衣衫,静静站在雨中观看。耐不住雨淋的老人和孩子陆续离场,青壮年却大多坚守原地,哪怕浑身淋得微凉,也执意要看完。

唯有遇上倾盆大雨,实在无法继续,放映才会被迫中止。哪怕故事才讲到一半戛然而止,第二天放映队依旧要按照既定计划奔赴下一个村,那份未尽的遗憾,便深深留在村民心底。

有一次,轮到我们村放电影,大雨连日不停,露天放映彻底落空,全村人满心期待尽数化为失落。但谁也没有想到,那天夜里,放映员在一户村民家中,对着墙壁悄悄放映起影片。放映机的马达低鸣,伴着电影的声响传到屋外,乡亲们闻声而来,争相往屋内挤。狭小的屋子被挤得水泄不通,挤不进去的人,便扒着门窗缝隙向内张望,全然不顾屋外依旧飘着冷雨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,一批新影片拷贝格外紧俏。为了让各村百姓尽快看上新片,县里时常调配拷贝流转,甚至安排几支放映队接力跑片。常常是一个村子天黑先放映一两卷胶片,便立刻拆下拷贝,由专人骑车连夜送往邻村,下一个放映点接续播放。一卷珍贵拷贝,一夜辗转两三个村落,奔波接力,只为把光影的欢乐送给更多人。遇上格外喜爱的影片,我们小孩子还会追着放映队跑往别的村子,一部电影看上两三遍不足为奇。动画

片《大闹天宫》、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,我就前后看了三遍。

当然也有扑空的时候。偶尔听闻邻村夜里放电影,几个孩童结伴兴冲冲赶过去,到场却一片寂静,根本没有放映的迹象。后来为了不白跑,我们便趁着白天放映员倒胶片的时候,上前问清楚放映地点。

记忆里最难忘的,莫过于我上一年级时观看《闪闪的红星》的那个夜晚。电影尚未开场,我和父母刚刚坐下,母亲就和身后一个女人闲聊起来。那声音我特别熟悉,我偷偷往后瞄了一眼,原来是我的语文老师,那时她刚结婚半年左右,上身穿一件干净鲜亮的粉红色褂子,在素净的乡村夜色里,格外亮眼。

母亲顺势聊起我的学业,老师向母亲夸奖了我几句。听着老师的声音,我的心怦怦直跳,只因我生性内向,不善言辞,平日里在街上远远望见老师,都要悄悄躲开。此刻和老师挨得这么近,纵然她语气温和,我依旧坐立难安。周遭的乡亲自在说笑,随口点评银幕上的人物,无拘无束。唯独我,端端正正僵坐在小板凳上,不敢扭动身子,不敢发出一点声响。

影片开场,《闪闪的红星》的片名一笔一画缓缓浮现,仿佛有人亲手书写一般。身后的老师轻声赞叹画面精巧;待到潘冬子进城到米店当学徒,在院子里劈了一大垛柴火,老师又由衷感慨道,这孩子真能干。看着看着,我有了尿意,明明知晓老师性情温和,不会苛责,心底的胆怯与拘谨还是让我硬生生忍完整场。

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农村的经济条件好了起来,村里兴起一个风气:家里遇上喜事,比如结婚、添丁进口、老人办寿,或是孩子考上大学,便会花钱放一场电影,请全村人一同沾沾喜气。我考上大学的时候,家里也请来放映队放了一天电影。

几年前,中秋恰逢国庆,我回乡探亲。中秋当晚吃过晚饭,我出门去探望一个儿时玩伴。踏着如水月色走在胡同里,望见前方十字路口围了一群人。走近一看,原来这里正在放露天电影。只是观众稀稀拉拉,不过几十个人。即便如此,也有不少人并没有仔细盯着银幕,有的人低声闲谈,还有人借着明亮的月光低头刷着手机。

如今再回想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,总会恍惚回到当年乡村广场的那个夜晚。打动我的早已不只是影片本身,那一方简陋的银幕,盛下的是乡村一代人纯粹滚烫的欢喜,还有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温情时光。

李启胜

在一个几千人的大矿里,矿工之间重名重姓,是再寻常不过的事。要是两个人一个在运搬,一个在采煤,不在一个部门,平时也没什么瓜葛,倒还好区分。就怕名字相同,年龄又相当,还在同一个班组工作,稍不留神就会闹出笑话。

我的矿工师傅鲁方义,就遇上过重名的麻烦。有一年,他从区队小干事手里拿到一封信,他以为是老家亲人寄来的,二话没说就撕开了信封。可越看里面的内容越不对,竟然是一封“求爱信”,看得鲁师傅心里直发毛,心想自己老婆孩子都有了,这是谁和自己开这样天大的玩笑?重新看一遍,信封上收件地址是矿的名字,收件人也是鲁方义三个大字,但寄件人的地址写的是“内详”俩字。

鲁师傅又把信仔仔细细读了一番,里面的内容让他脸红心跳,但信里也没提及地址,只提到小河、大柳树等很笼统的线索。最后还是他眼尖,从信封邮戳上,发现了“梁山”二字,找到了线索。他把信重新封好,送到矿收发室,交给了收发员,讲明原委。收发员一拍脑袋说,错了,这是四大机械维修班那个鲁方义的信。

师傅这才知道,原来矿上还有一个叫鲁方义的人,老家正是梁山的,是才分来不久的技校生。

鲁师傅后来自嘲地说,这真是关门挤了头——纯属巧合。俩人不在一个部门,都能闹出这样的误会,要是在一个班组,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少笑话。

有的单位有重名重姓的人员,为了区分他们,工资员往往在备注栏里写上“大”或者“小”二字。还有的同名同姓,但一个是男的,一个是女的,自然而然备注栏里会标上男女。

矿机修厂就有两个叫刘铁男的,一个是男的,一个是女的,俩人岁数都差不多,一个爱好打乒乓球,一个爱好打篮球。有时报名参加矿上的活动,矿上工会打电话通知参赛时,接电话的人往往要多问一句,是男的刘铁男,还是女的刘铁男?

早年间,没有手机,大部分矿工跟远方家人联系靠书信。有的矿工新婚燕尔,妻子思念丈夫,便写信说要来矿上探亲。那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,俩人在书信里也没有约定具体的时间。妻子突然到了矿上,当丈夫的却不知情,妻子只好到煤矿打听。煤矿地盘大,人也多,想找到丈夫,得打听半天。师哥钱明他媳妇就从济宁来矿探亲,碰巧矿上还有一个叫田明的。师哥的媳妇方言很重,那天,她到了矿上打听师哥。一位路过的矿工一听名字说认识,热情地上前接过师哥媳妇的大包小包,亲自把她送到了宿舍。等到半晌,人回来了,二人却谁也不认识谁,细说一通才知道弄错了。

重名闹笑话归闹笑话,有时候同名同姓也能碰上喜事。有一年国庆节,矿上宴请劳模先进,我也受邀参加,那年我获评局先进生产者。聚餐的时候,老矿长笑着说,今天是国庆节,巧得很,在座的有三个名叫国庆的。他端着酒杯,脸膛红润,面带微笑,高声点名:“王国庆,咱们的局劳模;张国庆,咱们的矿劳模;田国庆,咱们局生产标兵。”

三个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,酒杯碰在一处,叮当作响。我看着这场景,心头猛地一热:三个“国庆”凑在一块儿庆国庆,这是多大的缘分!那股子热乎劲儿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心里发烫。